



孙中山

——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美〕韦慕廷著 杨慎之译

中山大学出版社

孙中山

——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美〕韦慕廷 (C. Martin Wilbur) 著

杨慎之译

中山大学出版社

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美〕韦慕廷 (C. Martin Wilbur) 著
杨慎之 译
责任编辑 黎国器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番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字数350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统一书号：11339·4 平装定价：4.30元 半精装定价：5.20元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是为了替毕业学生从事东亚研究工作提供条件，为了帮助东亚问题的研究和出版，而于1949年建立起来的。对于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所给予的财政资助，研究所的全体研究人员谨表谢忱。

东亚研究所关于现代和当代的、重大的、新的研究成果，于1962年起进入了一个面向更为广泛的读者的新时期。

中 译 本 序

韦慕廷教授是美国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著名学者。他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在外国史学界享有盛誉。一九八五年，史扶邻（H. Z. Schiffrin）教授称这本书“至今仍是最持平的和最全面的孙中山的英文传记”。齐赫文斯基（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院士站在一个苏联学者的立场上对本书有所批评，但又认为它“是用充分文献资料论证的、最充实的外国研究孙中山的著作”。承美国陆培涌教授的介绍，韦慕廷教授在与我识面以前即慨赠《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英文原著一册给我，使我得以成为本书在中国大陆较早的读者之一。一九七九年，韦慕廷教授访华时，我又有机会与他就孙中山研究问题进行研讨。他对中国文化及孙中山研究方面的渊博知识，令人心折。这几年，我常向同事和朋友谈起韦慕廷教授这本书。最近，杨慎之同志把《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译成中文，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建议我给读者说几句话。作为一个研究孙中山的史学工作者，我为这部著作的中译本能在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出版感到高兴，因此，也乐于谈谈自己对这本书的一些想法。

杨慎之同志把这部著作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固然要实行开放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样不可以闭关自守。学术研究是没有国界的，对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成绩，我们应当肯定，他们的经验和方法，也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象韦慕廷教

授这部著作，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外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历史所达到的水平，了解外国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资料状况和写作技巧。这除了对专门从事孙中山研究的人以外，对其他方面的学术工作者，恐怕也是不无裨益的。这几年，我国陆续出版了一些现代外国史学著作的中译本，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高水平的国外学术新著介绍到我国来。

对我们这些从事孙中山研究的人来说，韦慕廷教授的著作更有扩大视野、促进我们深入思考的作用。孙中山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要认识中国的昨天和今天，都不能不研究孙中山。这大概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孙中山成为国外汉学研究者所重视的课题的原因。了解外国研究者如何看待、评价孙中山，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本书对孙中山的某些刻画，相信多数我国学者——无论是我国大陆还是台湾省的——都会感到难于接受。但这并不要紧，在一定意义上，甚至还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一个原因。就新中国的史学界而言，研究孙中山是有成绩的，特别是在近几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应当看到，我们的研究者中，多数人基本依据中文资料，用大体相同的方法去探讨。因此，所取得的成果虽百花争艳，但在格局上则不免稍有近似之感。韦慕廷教授这部在研究方法与结论上都与我们有很大差异的著作，无疑将会启发我们从更多方面去考虑，开辟蹊径，促使研究步步深入。例如，过去我们往往把孙中山晚年伟大的进步描述成一个近乎直线发展的过程；对影响这个前进过程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至孙中山个人性格等各方面复杂的因素，不能说已研究得很深入。对孙中山前进中的困难和奋斗，对他在决定联俄联共以后遭受过的非难和产生过的暂时的彷徨，相对地说我们是注意得不够甚至是较少正视的。读了这本书，我们对孙中山晚年的思想和活动，就会得到一个更全面和更深刻的认识。

此外，本书所引用的丰富的资料，必定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本书的注释和文献，占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无异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孙中山研究方面的外国档案资料的宝库。在我读过的研究孙中山的著作中，还没有一部能象本书引用那么多的美、英、日、德、法、苏等国的原始资料。孙中山一生中有很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国或在国外占据、租借下的我国土地上度过的。他曾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或殖民地当局的官员、企业家、报刊记者及其他各种人士打过交道，与一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志士有过联络，在国外华侨中更是进行了长期的活动。许多重要的记述和评论，往往只能从外国政府的档案、有关人物的私人文件及外国人所办的报刊中才能找到，在中文资料中则记载很少甚至毫无反映。我们对孙中山在国外的活动、对他与各国的关系的研究还很不深入，这不完全是因为重视得不够的缘故，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我们大多数研究者没有条件接触、利用收藏在外国政府机构、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私人手中的资料。因此，为研究者创造收集、利用外国档案资料的条件，是孙中山研究及其他很多方面的学术研究能进一步深入的重要途径，这是我读完本书后一种颇深的感受。

本书英文原著的书名用了“Frustrated Patriot”这个词组，如果直译成中文，大致是“受挫折（或遭受失败）的爱国者”，这似乎会给人以孙中山完全是个失败者的印象。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在他生前确实没有成功，他未能及身看到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可说是个失败者。但是，他对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巨大影响，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斗争；在他身后，中国革命成功了，中华民族继承孙中山遗志，终于取得全世界瞩目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又不能说是个失败者。现在，译者把上面的英文词组译成“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认为作者并不完全在贬抑的含义上使用

“Frustrated”这个词。我也注意到，作者在书中确是多次说到孙中山要革命，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只因客观条件所限和他本身的某些失误，才屡受挫折。本书叙述了孙中山在挫折面前决不低头、勇往直前、千方百计继续奋斗的过程，作者称孙中山是一个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国家的爱国者。也许作者对孙中山未必有一个褒贬的先入之见，但他客观地、详尽地论述孙中山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奋斗历程，对于孙中山的朴素、廉洁、坚忍的品格的肯定，这就使读者不会感到孙中山是个受贬抑的历史人物。

韦慕廷教授批评了他所认为的“神化”孙中山的倾向（这种批评不无一定道理），他对孙中山在领袖才能及政治家判断力等方面的缺陷是直言无隐的。孙中山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作为一个革命领袖，毋庸讳言有不少缺点，本书确实可以丰富我们对孙中山的认识。但我们必须看到，韦慕廷教授所引用的外文资料虽多数很有价值，但也有不实之辞。有些作者对孙中山怀有偏见，他们不理解孙中山与中国人民的血肉关系。本书作者也说过：“在中国，了解孙中山的大多数外国人，并不了解孙中山对于人民的吸引力。”应该说，这些外国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对孙中山也未必有真正的了解。例如，一些外国资料以讥讽的口气谈及孙中山对个人名位的态度，这是不太合乎事实的。孙中山为改造中国耗费了毕生的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他的一生看，很难说他对权位有什么迷恋或追求。依据带有偏见的史料而作出的评论，有时就难免出现一些偏差了。

本书用了主要的篇幅论述孙中山与外国、特别是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作者引用的资料很丰富，论证本身也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但必须指出，本书把孙中山与苏维埃俄国联合的关系归结为相互利用，是令人难于苟同的。如果全面考察中、苏及其他国家目前已披露的资料，全面考察孙中山晚年、特别是陈炯明叛变以后的言行，必须承认，孙中山与苏俄联合的主要基础是革命目标的

一致性。他向苏俄学习的态度是真诚的，联俄乃是他对外政策的主导面。孙中山在确定联俄政策后，继续致力于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如1923年与港英政府，1924年与美、日政府）建立或改善关系。本书在这些方面的详细而具体的论述，是作者对孙中山研究的一个贡献。孙中山晚年的外交活动，确有进一步全面地研究的必要。但孙中山这个时期与帝国主义各国的周旋，较之他联俄的根本大计，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相提并论的。

我对本书的若干论点虽有不同意见，提出和作者商榷，但却很难否认本书是一部谨严的学术著作。中华民族对孙中山这位“以其毕生精力献身于自己祖国的、不屈不挠的理想主义者的崇高敬意的感情”，韦慕廷教授是了解的。特别是，他写作本书的态度是认真的，对每一件事，都力求用各种来源的资料去说明，对引用的资料也尽量加以考订，正因为如此，总的说来本书对孙中山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

可以预期，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将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和重视。译者杨慎之同志，以前曾将美国学者薛君度的《黄兴与中国革命》与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译成中文。他是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的有心人，又是翻译高手，这在学术界早有定评，在此无须赘言。我要向读者补充说明的是，为了本书中译本能在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年的时候和读者见面，杨慎之同志奋战了三百多个艰辛的昼夜，译稿甫竣，他就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对译者这种献身的精神，我不能不表示衷心的钦佩。

陈 锡 祺

一九八六年五月于中山大学

中译本新序

由于孙中山是一位重要的世界性人物，所以，在西方，有着多种关于他的传记作品。中山大学的学者们认为我的这部专著值得在中国予以翻译和发表，对此，作为作者，我是深感荣幸的。这本书于十年以前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部出版，所以，作者难能从中国新近的学术研究成果之中增益受惠。不过，在这本书中，很可能有某些关于孙博士的资料，诸如他和日本、西方各国、苏维埃俄国以及和她们的代表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恐怕还是陌生的。

孙博士是一个属于全世界的人，他在海外寻求政治上和经济上援助的不懈努力，和他所遭遇到的挫折沮丧一样，人们都必须牢牢地予以记住。当他力图推翻清王朝或其后取代北洋军阀政府的时候，理解和意识到他在中国如何受到客观条件困厄制约的情况，也是一桩十分重要的事情。

作者试图理解这个非凡的人物：他的视野气宇和性格禀赋，都是经由中国和外国这两者的影响而陶铸形成的。他的爱国的目标以及他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也是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中国特殊环境所影响着的。换句话说，本书试图描绘一位对其祖国怀抱崇高理想的、无与伦比的杰出人物，但是，这位人物却几乎经常地受到一种颇难对付的环境的阻厄掣格。这也就是本书书题所示的“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的字面含义。

孙博士是一位令人神迷心醉的值得研究的人物。作者有自知之明：他的观点类皆局外人之见。现仍健在的了解了孙博士的人

们，真是凤毛麟角。时至今日，能够回忆起中国在孙中山所生活的时代是一种什么情状的人们，也是为数不多的。在试图理解认识孙中山的努力中，我们都只能凭借现成的文字资料——他本人的著述言论和其他人的专门论著。本书所勾勒出来的孙中山的形象，是有欠完整和远不丰满的。但是，作者希望，中国的读者们仍将发现，这本书又是饶有兴味的。

韦 慕 廷

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

目 录

中译本序

中译本新序

绪论·····	(1)
第一章 熏陶铸炼的影响和事业的方向·····	(12)
第二章 为革命筹款·····	(42)
第三章 为了反对清政府而寻找外援·····	(58)
第四章 利用外国力量的努力·····	(83)
第五章 向苏维埃俄国探寻摸索·····	(120)
第六章 有活力的联俄背景·····	(134)
第七章 在俄国的帮助下进行工作·····	(179)
第八章 挫折和新的希望·····	(243)
第九章 最后的追求探索·····	(284)
结论·····	(298)
在注释中所使用的缩写字体表·····	(306)
注释·····	(307)
参考书目提要·····	(410)
译后记·····	(431)

绪 论

认识“真正的”孙中山是有着许多困难的。在其活着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同时，论及他的大量著作都怀着敌意的偏见。在他逝世以后，一个神化的过程又开始了。一切政治派别的作者们论及孙中山的作品成千上万，用中文、日文、俄文和其它欧洲语文论及孙中山的学术性著作非常之多。¹ 用中文写作的孙博士选集有二十三个不同的版本，最近，其中的十八种因其集纳的内容不周而受到指责评审。² 我所使用的、内容丰富仅居第二位的孙中山著作、演讲、书札和电报的最流行的版本，共有2,600页之多。就在许多加入孙中山的某些革命组织的中国同志写出了关于孙的回忆录的同时，孙本人至少写过六个自传体的材料。³ 在这个浩瀚无涯的资料海洋之中，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孙中山呢？

孙博士的被人们神化，已经制造出了一个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和扭曲变形的历史真实。它把孙中山的个人特质弄得模糊不清，并将他的大多数革命同志投入朦胧暗影之中。此外，它使我们对于许多与孙中山有联系的事件的判断含混难辨，有些时候，它夸大了事件的重要性。

反过来说，神化也有某些好处。在国民党内的孙博士的追随者们，已经长期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有关他的活动、著作和言论的纪录案卷；他们出版了编年体的传记和回忆录文集；同时，从孙中山的事功和嘉言懿训的许多侧面，他们撰写了一些专著和论文。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学者能够自称已经理解了这些大量的文献

资料，但是，为了把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重新编排组织起来，这些大量的文献资料又是不可或缺的。

不管怎样，已经出版的书刊，决不足以表述孙中山终生事业的全部。大量的通讯，特别是写给外国朋友的书札，已经散落遗失了。显然，一部分文件，尤其是牵涉到他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的文件，至今仍被认为有点敏感，不宜发表。只有他的财务纪录案卷的片断是有所裨益的。许多重要的资料（无疑，其中某些资料将会令人瞠目结舌），也许还保存在档案馆、个人文稿、名气不大的刊物以及世界许多其它地方的银行和警局的纪录当中。⁴姑无论所有这些出版物已经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就，严谨的传记作者仍有大量的研究和发掘工作须待进行，以便揭示孙中山其人：他的私人的和奥秘的侧面。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和结论，而这样的判断和结论，势将被那些不了解史事的评论家据此而挑起争议。我们正在尝试着认识一个具有不同文化教养的人，此人诞生于一个多世纪以前，1925年就去世了。他所了解的中国，并不是那么容易振兴重建的。这样，我们从资料中拼凑到一块儿的片断内容，只能展现出其人、其时的表面图景。

在论述孙博士的尝试中，人们沿着一个须要谨慎将事的领域——中国人民对于他们的民族英雄的充满激情的忠诚——前行。一个局外人来议论品评如此一位尊贵的人物，中国的读者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僭越放肆之举。何况，对于斯时、斯人的研究还有待继续进行呢！

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的照片十分频繁地出现，虽然在此之前是少见的。孙中山青年时代的照片显示了他：瘦弱的骨骼和洁净的衣着，似乎是自炫于人的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八字胡须，他的黑发精致地向左边分开，涂着发油，向后卷起一个轻微的波浪。他的脸部肤色多少有些黧黑，但，正是他的“赏心悦目

的容貌”和“矮小的身材”打动了一位记者，当孙中山差点儿要满三十岁的1896年从驻伦敦的中国公使馆获得戏剧性的释放的时候，这位记者正巧在场。摄影师在孙中山四十过半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所拍的照片中，孙博士的形象是：坦率的面容，友善的笑意，目光炯炯四射。在集体摄影中，他经常坐在前排的中心位置，挺身直立，有时着军装，比他的大多数中国同事们略矮一些。随着年事渐长，孙中山开始发胖，稍后的照片显示，他的往后脑部分脱落的头发笼罩着一张慈祥和蔼但又饱经忧患的脸庞。

很多人都曾尝试要描述他的个性禀赋。人们不但可以阅读那些十分了解孙中山的人所写的阿谀奉承之作，而且还可以注意到那些都是非常严重的诽谤不实之词。有些人指出他的个人独有的吸引人的魅力，他的大无畏的勇气；他的忠贞不二或者是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其他的一些人则指责他的虚荣心理，他的攫取权力的欲望和感情用事的愚蠢。

在顾维钧博士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于1909年在哥伦比亚学院就曾见到了孙博士，虽说六十年一晃就过去了，但他仍然能够把这次会晤的情景生动地回忆起来：

我立刻为他的诚挚谦逊、和蔼可亲而深受感动。他是自古迄今迥异于其他领袖的人物。……当他和你交谈的时候，你立刻就会意识到，你是和他处于平等地位的。他平等待人，一如他是你们中间的一员。他滔滔不绝地说话，也会发问：“对于我的计划，您有些什么想法？”等等。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表示任何姿态。他从不摆架子，装腔作势。我揣想，这就是他团结吸引其他同志的伟大品格之一。……在我的整个生活中，我从未见到过象他这样的一个人物，一个如此伟大

的领袖，竟然如此平易近人！

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一个非常讲究民主的人，同时又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当他阐释自己的军事战略的时候，他总是流露出蕴量极大的热情。孙中山是具有这样一种性格的人：虽然他不能使所有的人追随他的党，但是，他能顺乎自然地激发起人们的感情，赢得友朋同志来追随他的事业。⁵

孙中山在香港时期的老师，1896年在伦敦援救他的人，尔后又成为他的挚友詹姆士·康德黎博士，把孙中山看做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物”。在历时二十五年的友谊结交的基础上，他作出了如下的描述：

和字面真实意义相符的博爱，这就是孙中山突出的品格。口是心非，为非作歹，对于孙中山的品格来说，确实是冰炭不容的。在他的每一言行中，一种对于周围人们寒暖饥饱的亲切关怀是显而易见的。在现代人当中所梦想不到的大公无私的程度：一个活生生的崇高道德的榜样。……他的成功的秘密在于无私：他只是为了祖国的富强而不断追求探索，并非为了一己的飞黄腾达，……当祖国的利益将有所保障的时候，他准备和渴求引退。……

我从来也不曾结识象孙中山这样的人，如果有人问我，要我把就我所认识的最完美的人物举出名姓来，我将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孙中山！在我们家里，他是最受欢迎的客人。孩子们和服务员们一样，对他表达了一种深切的关怀。他的柔和的脾气，他的温文有礼，他对于别人的设身处地的考虑和尊敬，他的饶有兴味的谈吐，以

及他的亲切仁慈的风度，使人难以言传地为之倾倒，并且使我想到，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一个执着于工作的献身者。⁶

李禄超先生于1910年结识孙博士，其后于1916—1924年担任他的秘书，最近他给我写信，对他的良师作了如下的描绘：

孙博士轻言细语，恬静而友善；他有民主风度，坦白正直，真挚诚恳。在谈话的时候，他经常面带愉悦的微笑。从来没有见到他处于盛怒和剧烈的激动之中。他气量宽宏，富于同情心，是一个容易交接相处的人。他很少“说笑话”，但他欣赏妙语如珠的谈吐，常用轻微的一笑来表示赞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没有任何一则喧腾欢闹的滑稽笑谈，能够从他那儿引发出高声大笑来的。

在公开场合讲话，他总是一个口才敏捷、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他有着鼓舞听众的才具，而且能够一口气不停顿地讲上几个小时。他的词藻不象汪精卫那样色彩斑斓富丽，那样移人感情，夺人心魄。他的演词是益人心智，启人灵感的，是振奋人心的。这种语言的特质是，它为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最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欣赏。……我还得补充一点，在他的演说词中，从来不使用强烈的、辱骂性的恶言秽语，在政治问题上，他从来不劝告听众采取暴力手段。他更不使用喧腾闹的口号来开始其演说，有如现时在绝大多数政治性集会和游行示威中所普遍习用的那样。在他的演讲词中，很少使用诸如“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对群众的剥削”和“阶级斗争”之类的套语。